

文教工作者的 思想改造問題

下 冊

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
宣傳委員會編

人間書屋刊行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

下 冊

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
宣傳委員會編

人間書屋刊行



目錄 (下冊)

(四)

我對「活教育」的初步檢討	陳鶴琴 (一一)
我對「活教育」的再檢討	陳鶴琴 (一一)
「活教育」的批判	曹孚 (二二)
「活教育」做了些什麼	張文郁 (三八)
我對「活教育」的再認識和自我批判	余介之 (五五)
從南京鼓樓幼稚園工作中檢討我自己	周淑鐸 (六八)

(五)

自我檢討	輔仁大學校長 陳垣 (七三)
批判我的「國際學者」思想	燕京大學勞動系教授 趙承信 (八五)
我跳出了帝國主義的陷阱	清華大學副教務長兼機械工程系教授 錢偉長 (九六)
錯誤在於我的「教育」觀點	董渭川 (一〇九)
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	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教授 金岳霖 (一二七)

批判我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清華大學教務長 周培源（一二七）

（六）

關於教育思想的自我檢討.....一 藥（一三六）

在「三反」運動中初步檢查我的教學.....中大附中 黎 黑（一四一）

痛下決心補償以前的過失.....中大附中 丘述堯（一四五）

堅決消滅頭腦裡的骯髒思想.....汕頭市第九小學 李盛材（一四九）

我對『活教育』的初步檢討

陳鶴琴

(一) 爲什麼要進行自我檢討

『人民教育』第二卷第六期和第三卷第四、五兩期先後發表了張凌光諸先生關於『活教育』的批評文章。我是『活教育』理論的初創人，在今天更願意深刻地檢討自己的錯誤教育思想，以便能更好地爲新民主主義教育事業服務。我細心地讀了張凌光等先生的文章，同時也曾向其他一些朋友徵求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我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啓發。經過一番思想檢討之後，初步地認識到我的『活教育』的主張，原來並不是什麼進步的東西，而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教育思想。由於我沒有階級立場，不問政治，幻想用教育來救國拯民，其結果，不但國沒有救成，反而爲反動派服了務，爲反革命統治裝飾了門面，因而損害了革命的事業。這正如錢俊瑞副部長在『從討論武訓問題我們學到些什麼』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點，就是所謂「超政治」「超階級」的教育觀，就是教育與政治分離的看法。他們認爲階級是不存在的，或者雖然存在也是不關重要的，政治則是「骯髒」的。他們只願意「清高」和「自在」地辦他們的「普及教育」，「科學教育」，「平民教育」，「職業教育」，「鄉村建設」，「民衆教育」等等；並且願意憑着這個「教育」之「萬能」來救我們的國家。結果怎樣呢？還和他們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這種「超政治」「超階級」的觀點和作法，在客

觀的社會實踐上，只是爲反動統治的糞堆插上了花朵，迷惘了勞動人民的認識，從而欺騙與麻醉了勞動人民，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的戰鬥意志，也就是這樣，幫助了中外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活教育』也就是這樣，在人民中散播了壞影響，幫助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動統治。

一個人的舊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改造過來的，因此我願意把自己的初步檢討發表出來，以便在大家的批評和幫助之下，達到徹底肅清自己錯誤思想的目的。這不僅對我個人而且對一些曾受過我的『活教育』影響的同志們，來清除改良主義的教育思想遺毒，也將是有利的。

（二）這不是『超政治』『超階級』的改良主義教育思想嗎？

我生長在小資產階級的家庭，長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社會，看到的盡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畧，國內軍閥的混戰，官僚的貪污腐化，老百姓貧窮如洗。當時我也曾爲中國的這種衰亡現象悲憤，我也曾立志要救國。當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反動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約的那年，我正在美國讀書，那時，我非常憤慨，爲了要報仇，便每逢星期五絕食一頓以效法『臥薪嘗膽』。這種天真幼稚的做法，一直繼續了半年，自然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後來，我便想中國人爲什麼不如外國人，受人欺侮，是因爲中國人本身『不行』；要是能把中國的『人』教好了，使他們具有健全的身體，創造的能力，合作的態度，世界的眼光，和服務的精神，那麼別人也就不會來欺侮我們了。於是，我選定了教育救國的道路。從來未認識到中國社會之所以落後，老百姓之所以貧弱，都是帝國主義侵畧和反動統治的結果，不打倒帝國主義，不推翻反動統治便不可能救國，以致數十年來，陶醉在教育萬能的美夢中而不能自拔。

很顯然的，我過去對『人』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我以為人只有好人與壞人之分，因為社會上有壞人，他們好侵略，好壓迫人，他們自私，就使得好人吃虧。假使能把壞人感化，變成了好人，社會豈不是就太平了嗎？我從這樣一種超階級的觀點出發，提出『活教育』的目的論，叫『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日本投降後改為，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滿以為人人都抱『假如我是你』的精神，用『照妖鏡』（忍耐）『天平秤』（公平）『十字架』（自我犧牲）的辦法來處世，『與世無爭』，就可以使戰爭消滅，使流血革命用不着，剝削壓迫也就不再發生了；却沒有認識到人是分階級的，剝削階級為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剝削人，壓迫人。不推翻反動統治階級，一切都是幻想。而且統治者剝削階級是決不可以理喻的，不作流血革命，階級鬥爭，武裝推翻反動統治，則反動統治是不會自動讓位的。因此我的『與世無爭』、『假如我是你』等等提法，適足以『削弱人民的戰鬥意志』。

由於我所了解的『人』是抽象的，沒有階級性與政治性，我所培養的『人』在主觀願望上是要他們為老百姓服務，要他們把社會改造好，但是，因為我沒有灌輸他們以先進的階級意識，正確的政治目標，在實際上，只不過要他們在反動政權下來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好人』。雖然提出了做『人』，『要』『愛國家，愛真理，愛人類』，因為缺乏階級立場和觀點，就成為空洞、不明確的教條。驟看起來，好像是標榜愛國，講求人道，但在反動統治下的舊社會中，國家只不過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屠殺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工具。那時『愛國家』其實質是愛反動階級的國家，其結果是鞏固了反動階級的統治。

這樣看來，我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或者『做世界人』，表

而好像是『超階級』『超政治』的，實際上還是『有階級』『有政治』。其階級性則屬於剝削階級，其政治則屬於反動政權，因此，今天如果不再從思想上來認清自己『超階級』『超政治』的改良主義教育思想的本質，是不可能在教育的實際工作方面，很好地爲新民主主義教育事業來服務的。

（三）主觀唯心論和狹隘經驗主義

我過去過分誇大了教育的作用，以爲單憑教育的力量就可以改造人，就可以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數十年來醉心於這種『教育萬能』的夢想，雖然在舊社會中也會碰過壁，遭到困難；特別是在一九四八年前後，幼專學生在上海大場辦農忙托兒所的時候，反動的上海教育局長李熙謀，曾不祇一次地警告我，留難我，而我仍沒有因此得到教訓，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却依然繼續着爲教育而教育的做法。

由於我沒有認識到教育是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爲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服務的，而錯誤地認爲舊社會的教育之所以沒有辦好，是因爲舊的傳統教育不行，教材不好，教科書錯誤很多，方法不好，教學法太死板的緣故，認爲用自己的『活教育』方法，就能培養出所謂『人』來，這就是所謂『活教育』的課程論『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和方法論『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實際上是承襲了杜威的『兒童本位』與『經驗論』，接受了陶行知先生『教學做合一』的主張。

杜威曾經說過，『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要發展兒童的個性，讓兒童在『做中

學」。杜威辦實驗學校，提倡打破系統的課程，要根據兒童的需要和興趣來經常改變課程。他的實驗學校中，教師在教學中是站在輔助的、被動的地位。杜威這種唯心的經驗論給我以很大的影響。當我主張用『活教育』的課程論與方法論來反對中國舊社會的傳統教材教法時，便有意無意地通過自己的主觀幻想，給以片面的論證。

我常常認為別人的經驗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親身經歷到的東西，才是可靠的；因此，我否定了人類祖先的經驗也否定了客觀真理的存在，沒有認識到科學在歷史階段中反映了客觀事物發展規律，是有其絕對真理性質的。知識的來源，除了感性的直接知識以外，還有前人的或別人的經過實踐考驗的科學與文化的間接知識。片面強調感性知識，其結果使認識停留在低級的階段，只能認識現象而不能認識本質。

我的這種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多半也是由於我運用了形而上學的方法來研究兒童心理發展的結果。我孤立地觀察兒童心理發展的個別現象，以為兒童生來時一無所知，通過自己的感覺和活動，逐漸認識了世界；由於摸到火，燙了手指，知道火是熱的，摸到木頭，知道木頭是硬的，片面強調感性，忽視了理性認識的重要作用。卻沒有通過這些現象，來深刻的理解到兒童心理發展的本質是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辯證的過程。

『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所謂『活教育』的課程論，就這樣的片面強調了自然界、社會生活中個別現象，對於教學的作用，否認系統科學知識的重要性，於是，在教育方法論上，自然也就陷入經驗論的泥沼中去了。我曾經很熱情的讚美過『讀活書，活讀書，讀書活』這個口號，也曾經歡迎過陶行知先生根據杜威的『從做中學』所得出來的『教學做合一』的口號。

我也曾嚮往於陶先生創辦曉莊師範時，指天空爲天花板，指大地爲地板，指自然界爲課堂的作法。我在江西開始辦幼稚師範的時候，也曾經醉心於『寓學於做』的辦法，帶着學生們開荒築路，蓋房子，種菜養豬，燒飯做菜，並且稱心滿意於這種魯賓遜的『變荒山爲樂園』。學生們工作了一天之後，同時就來上課，以一天生活爲題，學習作文認識自然，教材好像非常豐富，看到學生有了些收穫，興趣很高，就認爲這不但是『做中學，做中教』，而且也是『做中求進步』。並且根據這個別的現象，來作爲一般原則的根據，提出所謂『活教育』的教學原則『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還以爲這種直接經驗，就是『使人進步的最大動力』。

現在且不說這個『進步』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因爲在檢討『目的論』中已經說過了）僅就強調『做』這一點，在教育實際工作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呢？簡單回答，有下面幾條：

（一）教學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社會意識。

（二）不能給兒童以系統的科學知識。

（三）使兒童不能得到學習科學知識的基本能力。

（四）忽視教師的領導作用，使兒童流於盲目的摸索，嘗試錯誤，浪費時間。

（五）忽視教科書的作用，養成兒童狹隘經驗主義的傾向。

也許會有人以爲我這樣來否定『活教育』的教材教學法未免過分，或者認爲『活教育』的某些教學法也還有一定的價值，但是我却同意張凌光諸先生所提出的意見：首先用科學的世界觀，科學的方法論來克服『活教育』的缺點，改造『活教育』的思想體系，只有當自己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端正了，才能在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建設上，有所貢獻。

(四)「活教育」的壞影響究竟是什麼？

我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長期進行着「超政治」、「超階級」的改良主義式的教育，其所起的作用是什麼呢？我想就現在所記起的舉幾個事實來說明。

抗日戰爭前，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爲帝國主義辦教育，主觀上是想『收回教育權』，實際上是爲帝國主義服了務。抗日戰爭開始不久以後，我從上海到重慶經過江西，反動派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留我在江西辦教育。當時我對國民黨抗日所採取的兩面政策及其反人民的法西斯統治沒有認識，一心抱着爲教育而教育的觀點（這種觀點仍保留在『「活教育」產生的時代背景』一文中——見『活教育』五卷二期），以爲這是自己實現教育理想的好機會，並沒有理會到這個狡猾的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熊式輝，是盤算着利用我的教育工作，來爲國民黨反動統治裝飾門面，迷惑人民，以掩蔽其醜惡的反人民的面目。記得當時反動派原想請陶行知先生去講學的，後來因看到陶先生的一首詩，認爲靠不住，便改變了計劃。這就是所謂『不問政治』『自鳴清高』的我，正爲反動派所歡迎所滿意。很顯然的，在他們看來，我的教育主張是對他們的統治有利的。

事實也是如此，由於我長期做教育工作，又研究兒童心理，在美國留過學，在歐洲各國考察過教育，所見所聞，對於教育方面個別事例也很『豐富』，因此，就有可能在我的反傳統教育的主張中，補進了許多似乎足以聳人聽聞的材料。於是，一些具有改良主義思想的青年與教師也都覺得我是進步的，願意到我主持的幼師中來工作、來學習。我們辦學愈起勁，反動派就愈來愈喝采捧場，說我是兒童教育專家，是中國的『福祿培爾』，中國的『裴斯泰洛齊』。在這件改良主義外衣

下，我們都陶醉在『活教育』樂園之中，革命的青年們雖不只一次勸告我，但都被我的『豐富』的理論擋回去了。於是我的改良主義教育，就這樣地在舊社會中迷惘了許多人的戰鬥意志。直到後來回到上海，青年學生們都在革命運動中前進了。他們又自動地下鄉辦農村托兒所，而我從教育出發，也鼓勵他們去爲老百姓服務。這時反動派認爲我的改良主義教育已超出了範圍，終於二次把我逮捕起來，那時什麼兒童教育家，中國的福祿培爾，中國的裴斯泰洛齊都不知那裏去了。爲什麼開始時要喝采，來捧場，爲什麼看到我的學生與老百姓站在一起的時候，參加革命運動的時候，他們就要迫害我呢？回答是很簡單的，問題不在別的，而在於我的工作是不是對反動統治有利，現在我認識到這一點了。

我所培養的學生有很多也是爲反動派直接服務的。在我所辦的鼓樓幼稚園中，教養的很多是國民黨反動政權中上層官僚的子女。數十年來，爲他們服務，一直到解放後才有了改變。日本投降後，我還派我的學生到東北瀋陽去爲反動派辦『美齡小學』的，所做的同樣是糞堆插上了花朵的工作。

在今天我不僅認識到『活教育』理論在舊社會中所起的壞影響，而且我還得要說明在新社會中，當全國人民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時候，如果還不從思想上來清算這種改良主義的遺毒，那末，我們就不會很勇敢積極地參加現實的政治鬥爭，我們也不容易站穩人民的立場，來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國民黨反革命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不僅如此，如果縱容這種改良主義的教育思想，也同樣在教育工作上阻礙我們正確地認識和貫徹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與任務。

（五）改良主義教育思想的根源在那裏？

現在我打算來說一說我的改良主義教育思想產生的根源：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我的出身是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一方面感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排斥而日趨沒落，對舊社會表示不滿；另一方面又限於自身的階級利益而害怕嚴重的革命，特別是經過一番個人奮鬥之後，我又在舊社會中取得了『事業』和地位，更限制了已向革命靠近的勇氣。這樣，改良主義的『階級調和論』，就在我的身上找到了階級的基礎。

其次，我從小所受的是封建的家庭教育和教會的學校教育。我的母親具有濃厚的封建舊道德，無論是家庭間相處或與隣居發生糾葛的時候，她總是勸我們要忍耐，並且常常說『吃虧就是便宜』、『求人不如求己』。我在教會學校中讀書，所受的教育無非是『博愛』、『人道』、『從犧牲中得到快樂』這一套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宗教哲學。長期在這樣的教育影響之下，在我的思想上就失去鬥爭性和革命性。

第三、我在美國留學數年，在那裏我又接受了資本主義的反動教育，受杜威的實用主義與兒童本位的思想薰染，回國後，又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影響。

最後，我想附帶聲明兩件事：

第一、我在『新兒童教育』第六卷第十二期上用『活教育社』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敬請讀者對「活教育」展開批評』的文章，這裏所說的『活教育社』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社

圖，只不過是爲了出版『活教育』月刊時所用的名稱。

第二、我所以發表那篇文章，原意想提供一些關於『活教育』的材料，在取得大家的批評之後，幫助我能深刻地認識自己的錯誤思想，以便更好地做個自我批評，並非爲『活教育』的錯誤思想進行辯護。

一九五一、九、十三、於北京

我對「活教育」的再檢討

陳鶴琴

一、沒有認識自己

去年九月間我在北京會對「活教育」作了初步檢討，七個多月來，我除了不斷地作自我檢討以外，還很誠懇地虛心地向新教育先進同志們請求批評和指示，得到很多幫助，尤其是柳湜同志提醒了我，要從過去實際活動中去檢查思想根源和思想影響。我會照着他的指示切切實實地做了些檢查工作，並曾先後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出席過十一次座談會，每次都作了自我檢討。這種自我檢查和別人的批評，在我的思想上曾引起了一系列的激烈鬥爭，在情緒上也激起了一些波動、痛苦和興奮。從波動、痛苦轉變到興奮，標誌着我的思想鬥爭的勝利。因而深深地體會到我過去的教育思想是反動的，教育活動是錯誤的，我開始認識自己。但這些認識是不夠的，還有待於同志們的繼續批評和我的自我檢查。

過去我總以為認識了自己，並且教育學生也從「認識自己」開始。記得我曾在江西幼師的大禮堂上還題了「認識自己」四個大字，教導他們要了解人體生理機構之各種系統和它們的作用，要儘量保護它們，使它們獲得正常的發育以抵抗疾病、防禦疾病、增進健康。同時也要了解一個人如何透過感覺與實際經驗來獲得知識。還和他們講解格言。每天一句，要他們效法古聖先賢，並且日行一善。從小學到師範，都會這樣做過。這些都是僅僅從生理和心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

心理學觀點）上來了解人，而沒有從社會、經濟、政治以及人的階級性來認識人，完全是機械的看法，也是唯心的超政治超階級的看法。我沒有了解教育是政治經濟的上層建築物，更沒有了解人是在社會裡必須受社會環境影響的，人的思想是由他的階級來決定的，辦教育的人，如果沒有政治立場，沒有階級觀點，便必然地會受反動統治者利用，為反動統治者幫閒服務。因此我過去的所謂「認識人」「認識自己」，實際上沒有認識人，也沒有認識自己。這就是我造成錯誤的根源之一。

二、買辦階級思想的表現

我雖出生在破落地主家庭裡，由於親戚資助，個人「奮鬥」，使我由小學而中學、大學以至留學，回國後專門從事教育工作。因此，我一向自認為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其實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與統治階級的政治主張也有一定的距離的。我呢？從來只是抱着「教育萬能」的錯誤觀念，並且聽任反動派利用我，我却忠心耿耿地為他們在糞堆上插花。怎能算是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呢？可是，當我在上海出席「活教育」的座談會時，有位同志說我是買辦階級，我當時覺得很難受。我自以為沒有替帝國主義者服務，怎能算是買辦階級。仔細檢查，發現我過去是一個徹頭徹尾地崇美親美的人。因為我一生所受的教育，國內國外先後十四年，全部是美帝文化侵略的毒素教育，不自覺地中毒甚深，因而處處表現着濃厚的買辦思想，這裡舉幾個例：

1. 我的七個孩子除了第一個一鳴以外，每個都取了英文名字。